

新中国 60 年塞万提斯小说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王 军

内容提要 作为中国最知名的西班牙语小说,《堂吉诃德》的丰富性和多面性使其在中国历久弥新。在鲁迅和周作人等老一辈文学大师的评介基础上,60年来中国学者和读者对它进行多重解读和定位,堂吉诃德也成为国人心中理想主义的典型形象。这部西方巨作如何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成为中国塞学的一个基本命题。

关键词 塞万提斯 《堂吉诃德》 中国塞学

西班牙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家塞万提斯(1547-1616)凭借其传世之作《堂吉诃德》(1605-1615)而被誉为“欧洲现代小说之父”,迄今仍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2001至2002年由诺贝尔文学院等有关机构举办、54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位作家和文化名人评选的“100部世界最伟大文学作品”,《堂吉诃德》高居榜首。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第二部的献辞中写道“最急着等堂吉诃德去的是中国的大皇帝。他一月前特派专人送来一封中文信,要求我,或者竟可说是恳求我把堂吉诃德送到中国去,他要建立一所西班牙语文学院,打算用堂吉诃德的故事做课本;还说要请我去做院长。”塞万提斯的梦想终于在四个世纪后变为现实,从1922年林纾、陈家麟以文言文首译《堂吉诃德》(第一部)《魔侠传》起,至今

国内已推出56个不同版本的《堂吉诃德》,在1975-2010年之间国内就发表了近200篇有关《堂吉诃德》的论文,《堂吉诃德》是拥有最多中译本、在中国最有影响、研究最多的西班牙小说。

关于中国对塞万提斯及其《堂吉诃德》的接受和研究,陈国思做了以下的概括“20世纪中国对这部小说的接受折射出了中华民族在此期间所经历的历史和现实的挑战,以及中华儿女所做出的悲壮回应,在新世纪曙光降临之际,理清这一接受史,取得其中的文化资源,对于中华民族自信地面向未来,会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①

一、建国前塞学研究的简要回顾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塞万提斯研究起点高,影响大,鲁迅、周作人、茅盾、郑振铎、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项目编号:09&ZD071)阶段性成果。

郁达夫、瞿秋白、唐弢等现代文坛大家都对《堂吉诃德》给予高度重视和评价。塞万提斯的名字最早见于《江苏》杂志第 11、12 合刊（1904 年 4 月 1 日）的世界名人录，^②将他的名字译成“沙文第斯”。除了注明他的生卒年，著有小说《唐克孙脱》（*Don Quixote*）外，还评述这部作品“不追前轨，莫步后尘，曼然称杰作”。^③

建国前对塞学研究最有见地和贡献的当属鲁迅和周作人。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学期间就阅读了德文版《堂吉诃德》，周作人在其所著的中国第一部《欧洲文学史》（1918）中除了略述塞万提斯生平外，还高度赞誉《堂吉诃德》的精神魅力，指出“其书能使幼者笑，使壮者思，使老者哭，外滑稽而内严肃也”，并将无法适应现实的理想主义精神概括为堂吉诃德主义，“然古之英雄，现时而失败者，其精神固皆 *Don Quijote* 也，此深长思之者也”。^④

随着这位西班牙骑士走进中国读者的视野，一系列有关塞万提斯的文章也相继发表，^⑤并引发了中国文坛两场著名的论争：周作人与陈源、鲁迅与创造社及太阳社，分别就堂吉诃德精神的实质进行辩论。周作人秉承屠格涅夫《吉诃德与汉列忒》一文观点，即“堂吉诃德代表信仰和理想，汉列忒代表怀疑与分析”，因此他认为，“《吉诃德先生》书内便把积极这一面的分子整个的刻画出来了。”^⑥

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将吉诃德精神简单地误解为一种“悖时的精神”，称鲁迅为“中国的堂吉诃德”、“文坛的老骑士”，为此鲁迅特意约请郁达夫将屠格涅夫的文章从德语转译过来，发表在 1928 年《奔流》创刊号。鲁迅在《编校后记》中将堂吉诃德精神概括为“专凭理想勇往直前去做事”，但他也指出堂吉诃德的“错误是在他的打法。因为糊涂的思想，引出了错误的打法”。^⑦其后续杂文《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1932）、《真假堂吉诃德》（1933，与瞿秋白合著）继续阐释堂吉

诃德在中国的影响与被接受时的误解，并对那些假堂吉诃德予以抨击。姚锡佩在《周氏兄弟的堂吉诃德观源流及变异——关于理想和入道的思考之一》（1989）中对鲁迅、周作人推介《堂吉诃德》的过程以及对此人物的研究、争论、定位及评价做了缜密的梳理，提供了许多有史料价值的信息和资料。^⑧

另外，谢六逸的《西洋小说发达史》（1922）、郑振铎的《文学大纲》（1925）、万良浚、朱曼华的《西班牙文学》（1931）、瞿秋白的《吉诃德时代》（1931）、茅盾的《吉诃德先生》（1935）从各个层面评价《堂吉诃德》：主人公的苦运生涯“简直可以称为有味的哲学之叙事诗，把勇壮、怯懦、平凡、奇异都铸为一炉里面”，^⑨其基调“乃是一种明显的人道主义”，吉诃德“决不以失败为自馁”，是“一切先驱者的精神”。^⑩塞万提斯以“一种讽刺的笔法”使骑士小说的“命运终止”。

抗战时期，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精神十分契合当时的国情，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位西班牙骑士身上看到了榜样的力量。唐弢的《吉诃德颂》（1938）便赞扬他“不仅出现在书本里，同时也活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里，历史正是靠着‘为大众去冒险’的精神而进展的”。^⑪可以说，只有经过 20 世纪 20 至 40 年代的百家争鸣，堂吉诃德才“在中国知识界有了真正与其经典性相称的知名度”。^⑫但这一时期国人的焦点几乎都局限于如何看待堂吉诃德这一人物形象及其精神实质，很少涉及此著作的艺术性和审美性。

二、1949 - 1977 年间的研究状况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在塞万提斯作品的翻译上取得新的突破。1954 年再版了伍实（即傅东华）从英文译出的白话文版《吉诃德先生传》，1958 年祝融从其他语种转译了塞万提斯的《惩恶扬善故事集》中的五个短篇小说，^⑬孔令森译《诈骗婚姻》，杨德友译独幕剧

《奇迹剧院》，1959年傅东华的《堂吉诃德》全译本问世，这些译著扩大了塞万提斯在中国的知名度。

1955年中国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号召，在北京举办“世界名著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出版100周年、《堂吉诃德》出版350周年纪念大会”，《人民文学》、《新华月报》、《文艺月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杂志纷纷刊登有关塞万提斯及其《堂吉诃德》的文章，如叶君健的《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堂吉诃德〉的现实主义》、^①巴金的《永远属于人民的巨著》、周扬的《纪念〈草叶集〉和〈堂·吉诃德〉》、文学翻译家曹未风（1911-1963）的《纪念〈堂·吉诃德〉出版350周年》和冰夷的《纪念〈堂·吉诃德〉出版350周年》，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不大不小的“塞万提斯热”。

50年代的评论都把《堂吉诃德》定位为“现实主义巨著”，但对其具体的艺术特征极少指涉。至于其主人公，周扬认为“堂吉诃德是可笑的，但始终又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化身”，^②而王淡芳虽然承认“这个可笑又可怜的拉曼却骑士的形象是极其复杂矛盾的”，但基本上否定了堂吉诃德的正面意义，声称“堂吉诃德这一典型，具有所有脱离生活，落后历史进程，以幻想代替现实的人的广泛代表意义”。^③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些论点不足为奇。更可笑的是在一些《堂吉诃德》的研究中，桑丘的地位比主人还显赫，成为农民的代表。^④

60年代有两种评论值得注意。一是杨绛归纳分析堂吉诃德在各国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历代读者或是强调他的某些特点，把他性格上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代替了他全部性格；或是加上主观成分，歪曲了他原来的性格。”^⑤从读者接受美学的角度切入《堂吉诃德》在当时是十分超前的；二是杨周翰等人

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上卷，1964）肯定了《堂吉诃德》的艺术成就“标志着欧洲长篇小说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塞万提斯虽然模仿骑士传奇，但是主人公的游侠不在离奇虚构的环境中进行。”但该书也有一些观点偏颇，如说它的伪造续集是由“反动集团”撰写的，并且自《堂吉诃德》后“西班牙再也没有出现过骑士传奇”。实际上伪续集出自费尔南德斯·德·阿维利亚内达之手，而关于此人的真实身份目前学界并无定论。至于骑士传奇，反宗教改革的特兰托教务会议（Concilio de Trento, 1545-1563）就已经把它列为禁书，它的绝迹并非塞万提斯之功。

总体来看，由于国内左倾政治环境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前的塞学研究思路狭窄，对西方塞学的传统、现状及成果知之甚少，研究手法滞后，对堂吉诃德和桑丘的评价带有很深的意识形态烙印，可以说是中国塞学的低谷期。

三、1978至1999年的研究状况

改革开放后中国塞学开始走上正轨。无论是塞万提斯作品的翻译，还是对《堂吉诃德》的评价，抑或对塞万提斯本人的研究，都力图摆脱“文革”的消极影响，不再单纯探讨作品的思想意义、人物性格，而是从比较文学、现代性等角度对《堂吉诃德》进行全方位的阐释。

这一时期陆续问世的塞万提斯传记类作品有《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文美惠著，1981）、《塞万提斯：1547~1616》（张书立著，1982）、《著名西班牙人文主义作家塞万提斯》（黄道立著，1987）、《荒诞的理性：塞万提斯与〈堂吉诃德〉》（崔杰著，1993）。

一些西方塞学经典成果首次或再次被译介到国内，如阿根廷塞学家胡安·包蒂斯塔（Juan Bautista, 1927-2009）的《塞万提斯》、哈利·列文的《吉诃德原则：塞万提斯与其他小说家》、海涅的《论〈堂吉诃德〉》、卢卡

契的《论〈堂吉诃德〉》和屠格涅夫的《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等。

这一阶段国内塞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为杨绛先生。1978年4月杨绛首次从西班牙语译出《堂吉诃德》，成为80年代乃至90年代初我国《堂吉诃德》的权威译本。她在《〈堂吉诃德〉译余琐掇》中总结了自己的翻译经验和体会，评价堂吉诃德这一人物形象是“知其不可为而勉为其难”，叹其可敬与可悲之处。^①她还论述《堂吉诃德》风行全世界的原因，指出堂吉诃德的思想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理想，以及这种理想和16世纪现实的矛盾，而堂吉诃德和桑丘是既特殊又典型的典型人物。^②

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堂吉诃德》的研究尚沿用传统套路，主要关注堂吉诃德这一形象的典型性。虽然学界大多学者认同堂吉诃德是个“矛盾复杂的人物形象”，但如何看待这一矛盾体则分歧较大，比如文美惠认为堂吉诃德是“骑士的典型形象”，^③而孟宪强却否定了这个观点，说他是“患了游侠狂的学者形象”。^④

另一种很常见的思路是从比较文学的视角看待《堂吉诃德》。一是把堂吉诃德与阿Q、孙悟空、阿夫季及福斯塔夫等中外经典人物进行对比，“阿Q形象是堂吉诃德形象的‘影响性再现’”这一观点被普遍接受。^⑤至于堂吉诃德与福斯塔夫，有的认为二者都是“永久被嘲笑的对象”，有的则认为屠格涅夫夸大了堂吉诃德的正面特征，他与“腐朽不堪的福斯塔夫是两类不同的典型形象”。^⑥还有学者看到“日神阿波罗在堂吉诃德、酒神狄奥尼索斯在福斯塔夫身上的投影”。^⑦

二是从文论、名著续写等角度将《堂吉诃德》与《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加以比照，阐述中西行为的动机及写作方式上的差异性，^⑧得出“异地则同，易时而通”的结论。^⑨

80年代中期拉美“爆炸文学”、魔幻现实主义及其代表作《百年孤独》在国内产生巨大反响，同时也为塞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1986年“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在上海隆重纪念塞万提斯逝世370周年，会议论文既有研究《堂吉诃德》在我国不同时期的出版及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有分析《堂吉诃德》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影响。陈众议认为魔幻现实主义所渲染的神奇气氛无不基于人物的魔幻意识，就像《堂吉诃德》的奇情异想无不基于人物的骑士思想一样。两者的共同特点还在于用合理的夸张、讽刺的手法和鲜明的形象，反映一种具有时代特点的心理现象。^⑩

关照、借鉴和翻译西班牙本土塞学成果也是国内西语界从事的一个重要工作。张绪华对西班牙“98年一代”的主要成员，如乌纳穆诺、阿索林、马埃斯图在这一领域的专著《堂吉诃德和桑丘的生活》、《堂吉诃德之路》、《堂吉诃德、堂璜、塞莱斯蒂娜》进行梳理和点评，指出“98年一代”研究《堂吉诃德》是为了给当时处于衰败中的西班牙寻找出路。^⑪

80年代对《堂吉诃德》的叙事模式和修辞手法研究有限，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或涉及该著作中谚语和同义词的使用，^⑫或点评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本身就是为了倡导用散文的形式描叙史诗”，^⑬或从叙事结构入手，认为《堂吉诃德》为近代长篇小说结构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即以点与直线、方块（框架式）等多元几何定向组合成的有机结构形态”。^⑭还有评论认为《堂吉诃德》的画面具有强烈的视觉感、动感、立体感、不对称性；人物形象具有运动性、造型性；作家视点不断转换，“这在《堂吉诃德》之前的文学创作中是不多见的”。^⑮

90年代对《堂吉诃德》的研究进入现代性层面。饶道庆借鉴巴赫金的“复调理论”，

指出在《堂吉诃德》中“由理智和情感的二重性而萌发的‘多声部性’的复调因素促成了堂吉诃德这个人物的未完成性和开放性”，同时他认为《堂吉诃德》具有双重叙述话语，“堂吉诃德不仅是一个被叙述的客体，在游侠过程中他还成了一个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的叙述主体，堂吉诃德的叙述是一种虚构叙事，他的视角正好和理智、现实相反”。^④

董燕萍也认为《堂吉诃德》所涉及的现实与虚构、创作与阅读、叙述主体与客体、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关系堪称当时欧洲小说全新的观念。“塞万提斯在小说中通过第二作者讲述小说的寻源，既显示小说来源的可靠性，又反映了他对文学传统的自觉认识。”^⑤

对堂吉诃德形象的理解也摒弃了喜剧性/悲剧性或疯狂/理性的简单二元对立。杨传鑫注意到，在《堂吉诃德》第一部和第二部里，人物性格、作者态度发生了重大嬗变。“《堂吉诃德》发展变化的态势一由喜转悲，对主人公的肯定、赞美、颂扬由弱加强，直至出现公开的、鲜明的褒扬。”^⑥周宁也认为，《堂吉诃德》“以幻想的喜剧形式反讽地表现了英雄受难的悲剧，以荒唐的滑稽模仿检验人类高尚的道义与信仰在世俗中经受考验与误解的能力”。^⑦

有关塞万提斯创作动机和宗旨的探讨持续不断，但各种观点差异很大。既有全盘相信塞氏本人的声明，也有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得出前所未有的诠释结论，“《堂吉诃德》的写作动因不是为了攻击骑士小说，恰恰相反，它蕴藏着追怀骑士时代、赞美骑士道德、效法骑士风范的内在意义张力。”^⑧还有观点称塞万提斯创作《堂吉诃德》是为了“展示他的伟大抱负和理想。”^⑨

钱理群的专著《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1993)可以被视为本土塞学的一个重要风向标，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堂吉诃德及哈姆雷特的接受、认可过程的一次

全面回顾和认真反思。^⑩这位鲁迅研究专家一方面梳理了堂吉诃德、哈姆雷特从西班牙、英国走向德国、俄国的历程，论述了这两位世界文学的经典人物在20世纪20至40年代的中国的传播及影响，另一方面高度肯定了周氏兄弟对堂吉诃德的创造性阐释。“周作人明确地提出了堂吉诃德的‘归来’命题……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从一开始便在乌托邦理想这一根本点上，取得精神的共鸣与契合……鲁迅关于要划清理想与现实、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界限的思想，其实是抓住了堂吉诃德精神的要害……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他为沉默的中国国民灵魂造像，塑造了阿Q这一中国现代文学的不朽典型。而且人们很快就注意到阿Q与堂吉诃德精神上的相通。”^⑪

1995年董燕生版《堂吉诃德》问世。他认为，“现代小说的历史是《堂吉诃德》开创的，因为它具备了几乎全部的有关特点。”^⑫1997年是塞万提斯诞辰450周年，值此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八卷本《塞万提斯全集》(董燕生等译)，这是国内有史以来最全面的塞万提斯译介。此书的编辑胡真才在《出全集：严肃的大事难事——中文版〈塞万提斯全集〉编后谈》一文中回顾了该项目所走过的艰难历程。^⑬

同年9月，南京大学塞万提斯中心举办了亚洲第一届塞万提斯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的主题有塞万提斯对20世纪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文学的影响、博尔赫斯眼中的堂吉诃德、伏尔泰与塞万提斯等。该中心主任陈凯先是中国塞学开拓者之一，举办了数届塞万提斯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塞万提斯评传》(1990)和《塞万提斯》(2001)两部著作，其相关论文《从〈堂吉诃德〉到〈百年孤独〉》、《文学理想现实》、《〈堂吉诃德〉的魅力》及《〈堂吉诃德〉对现代小说的贡献》从不同层面探讨了《堂吉诃德》对西班牙、拉美乃至整个西

方现代小说的深远影响和贡献。^④

四、2000 - 2011 年的研究状况

进入 21 世纪，塞学领域涌现出不少新成果。传记类新作有《塞万提斯与堂吉诃德》（孙海蛟著，2001）和《塞万提斯评传》（朱景东著，2009）。德国学者布鲁诺·弗兰克的《塞万提斯传》（2006）、纳博科夫的《堂吉诃德讲稿》（2007）、博尔赫斯的《吉诃德的部分魔术》（2009）、西班牙作家特拉彼略的《塞万提斯传》（2009）和《塞万提斯后传》（2008）、南非安德烈·布林克的《小说的语言和叙事：从塞万提斯到卡尔维诺》（2010）均被译介到中国。同时纳博科夫和哈罗德·布罗姆对塞万提斯及《堂吉诃德》的精辟论述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⑤

《堂吉诃德》所蕴含的后现代性是当代学界研究的重点。第一，它的元小说性得到广泛的认可，“《堂吉诃德》被称为小说最伟大的祖先，正因为它是具有原型意义的‘元小说’……塞万提斯在讲述一个冒险故事的同时，探讨了小说是如何被创作、被阅读的诗学问题”。^⑥

第二，《堂吉诃德》的反讽、讽刺功能引起各方的关注。宗笑飞以马科斯·缪勒对《五卷书》的研究为例，认为它可能是《堂吉诃德》反讽风格的一个源头。^⑦蒋承勇、张伶俐也强调《堂吉诃德》中各种讽刺、反讽的运用，“以虚拟的讽刺、现实的讽刺、讽刺的讽刺以及双向讽刺等多重讽刺视角描述生活和塑造人物，表达了新的人文观念”。^⑧

第三，塞万提斯超前的小说观被纳入叙事学、读者接受等诸多当代理论框架内加以剖析。“作者认为小说居于历史和文学之间的区域，将历史纪实与想象虚构融为一体……小说还包含多个叙述者和叙述层面，彼此协调渗透；此外，只有建立在读者理性认同基础上的小说阅读，才不会沦为阅读的‘虚假快

乐’。这些观点……为‘小说的兴起’立下开创之功。”^⑨

第四，突出《堂吉诃德》的狂欢化倾向。叶青借用巴赫金的狂欢诗学理论总结出塞万提斯“塑造的人物形象的狂欢化”和“创作时艺术思维的狂欢化”两大特征，并且“从更一般和更广泛意义上的民间狂欢化文学的两重性——‘死亡’和‘新生’这个角度”阐述《堂吉诃德》如何终结了骑士小说。^⑩

至于《堂吉诃德》是否暗含了殖民叙事，学界的看法截然相反。蹇昌槐从后殖民批评的理论出发将《堂吉诃德》定位为“一个典型的殖民主义文本”，认为，“其总督迷梦的核心是建立事实上的海外殖民统治，游侠狂想的实质是铲除异教的妖孽，文明的召唤则旨在张扬基督教的救赎力量。”^⑪而索飒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运用大量外文资料，并结合伊斯兰教教义，层层考证塞万提斯的隐秘身份，推出令人吃惊的结论，即塞万提斯的身世“也可能与穆斯林有着深切纠葛”，并且“这部世界名著之中充斥着对当时西班牙所执的宗教压迫和血统清除国策的控诉”。^⑫

塞万提斯的生平至今仍有许多谜题，例如西班牙文学史一般把塞万提斯的生辰定为 1547 年，但西班牙学者凯撒·布兰达里茨在他的最新专著《重建塞万提斯》、《解码塞万提斯》和《说话困难的人》里确认塞万提斯的出生年份应为 1549 年。庄丽肖的文章《塞万提斯身世之谜或告破解》便介绍了这一重大发现。^⑬马联昌的论文《塞万提斯的中国情结——〈唐吉诃德〉下卷〈献词〉释疑》则多角度探索了塞万提斯受明朝万历皇帝之邀访问中国的可能性。^⑭

李德恩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提出不少新的见解。他认为塞万提斯在创作中表现出对历史事件和事物认识上的偏差，如“反人性的禁欲主义实践、对摩尔人被驱逐出西班牙的错误认识等等”。^⑮其次，堂吉诃德临

终前的沮丧“反映了封建势力的强大和个人力量的渺小。他的遗嘱是对人文精神的背离”。^⑤再次,堂吉诃德虚构的魔法师和杜尔西尼娅表现了这位骑士既铁骨铮铮又柔情似水的双重性格特征,而对堂吉诃德的“误读自古流传至今,歪曲了堂吉诃德的形象”。^⑥

非西语专业出身的罗文敏是中国塞学的后起之秀,他先后发表了《语句有涯能指无垠》(2004)、《论〈堂吉诃德〉中戏拟手法的艺术表现》(2007)、《解构重构性在〈堂吉诃德〉中的多样化表现》(2007)、《不确定性的诱惑〈堂吉诃德〉距离叙事》(2009)等系列论文,从语言、艺术、叙事、人物、后现代性等方面,对《堂吉诃德》文本进行多角度的研究。这些论文构成了他的专著《我是小丑: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研究》(2007)的基本组成部分,该书有两大亮点:一、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讨《堂吉诃德》与狂欢化、梅尼普体讽刺的关系;二、从后现代性的角度谈《堂吉诃德》文体的不确定性、解构重构性(戏拟、文本互涉等),指出《堂吉诃德》是一部后现代性很强的小说。另外还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堂吉诃德》是一部自传性用意很强的小说。

2007年问世的还有陈众议的专著《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他在其中单辟一章专门论述塞万提斯的生平、诗歌、短篇小说及《堂吉诃德》。他的《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2011)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高屋建瓴地对西方(德、法、英、俄、西班牙等国)自17世纪以来四百多年的塞学学术史进行全面梳理、比较和研究,对其来龙去脉、历史演变、百家之言、各家之长加以客观点评、大胆质疑和深入探讨。这一工程庞大繁杂,书中所收集、整理、翻译的外文资料浩如烟海,许多信息(尤其是西班牙本国关于塞万提斯的研究)对于国内学界来说都是首次接触,学术价值极高(书后所附的文献目录是塞学研究

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其次,此书的研究方法十分科学,既有历时性的脉络梳理,又有共时性的比较、对照(包括中、西塞学研究特色的比照),还有专题性点评(如对堂吉诃德形象的接受与阐释、《堂吉诃德》版本学、《堂吉诃德》与文艺复兴运动的互动关系等)。与《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配套的《塞万提斯研究文集》(2012)将西方不同历史时期涌现的经典成果翻译成中文,使中国读者能够零距离地了解西方名家对塞万提斯及《堂吉诃德》的不同解读和评价。^⑦

五、问题和反思

纵观新中国60年的塞万提斯小说研究,应该看到,尽管一代又一代国人对《堂吉诃德》的不倦阐释和多层解读已经硕果累累,但还遗留了不少问题和空白:

一、研究点极不均衡,仅仅关注《堂吉诃德》这部长篇小说,对塞万提斯的短篇小说缺乏基本研究,给读者造成塞万提斯只靠一部作品名垂青史的错觉。其实他的《警世典范小说集》(1613)是西方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集之一,也是西班牙第一部道德教化型短篇小说。塞万提斯不但在这部作品中提供了他唯一的一幅自画像,而且在序言里明确阐述了自己的小说观,对我们理解《堂吉诃德》(1605-1615)的创作、特别是其第二部基调的变化十分有益。塞万提斯戏剧、诗歌创作研究更是少得可怜,杨德友的《奇迹剧院》和康健兵的《浅论塞万提斯戏剧创作与理论》是国内关于塞万提斯戏剧的仅有两篇论文。可以说对这位西班牙文学大师的全方位认识有待加强、深化,中国塞学研究体系尚有不少空白。

二、《堂吉诃德》接受的广度与研究的深度不均衡。堂吉诃德这一形象在中国妇孺皆知,连中小学课本都收入了此作,但对它的研究总体上看还是比较肤浅,重主题思想、人物形象,

轻叙事技巧、语言风格。即便如此，一些基本问题至今也尚无普遍接受的定论，如堂吉诃德究竟是“为理想而献身的悲剧英雄，还是‘贻笑于现实社会’的喜剧小丑，或悲剧性与喜剧性兼于一身？《堂吉诃德》的真实创作意图究竟是什么？另外，绝大部分论文是围绕堂吉诃德与桑丘这对主人公展开的，但对塞万提斯在小说中安排的许多不同身份的次要人物（包括以杜尔西尼娅为代表的女性人物）关注极少，而这些人“除了是堂吉诃德故事的见证人，还是质疑者、解答者、评判者”。^⑨因此这部作品的多面性和开放性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三、对《堂吉诃德》的学科分析有失均衡。迄今为止的研究都集中在文学领域，很少从语言学和文化翻译的视角来审视《堂吉诃德》。该作包含了大量的习语、谚语、诗歌、寓言、民间传说等，是一座西班牙语语言宝库，从语言学的角度系统研究其中丰富的语言现象将是中国学者（尤其是西语界同仁）的重大使命。另外，虽然林一安、陈众议、陶梅等学者曾就杨绛版和董燕生版的《堂吉诃德》进行过比较，^⑩但基本上局限于探讨译本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尚无人运用文化翻译理论对长达 90 年的《堂吉诃德》中译现象进行全面梳理和点评。

综上所述，塞万提斯及其《堂吉诃德》在中国乃至全球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时代的发展、社会的演变，均无法回避理想与现实的纠结与冲突，因此历朝历代读者都会有自己心目中的“堂吉诃德”。该著作的后现代开放性为国人的解读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因此对这一经典形象的阐释将越来越丰富、深入和多元，同时也会拓展对塞万提斯的全方位研究。有堂吉诃德相伴，人生的旅程一定不会寂寞。

注释：

① 陈国思 《〈堂吉诃德〉与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载

《外国文学研究》2002 年第 5 期。

② 罗家伦主编 《中华民国史料丛编》，台湾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辑出版（影印本）。

③ 转引自 file:///D:/back/30 年外国文学研究/无标题文档.htm。

④ 周作人：《欧洲文学史》，东方出版社 2007 年版，187 - 190 页。

⑤ 茅盾的《两个西班牙文人》（维伽和塞范忒司），载《文学旬刊》第 85 期，1923 年 8 月 27 日；陆祖鼎的《西班牙守文德的〈唐克孝传〉》，载《学灯》，1924 年 6 月 6 日；傅东华的《西万提斯评传》，载《小说月报》16 卷第 1 号，1925 年 1 月 10 日；周作人的《塞文狄斯》，载《语丝》57 期，1925 年 12 月。

⑥ 周作人：《魔侠传》，《小说月报》16 卷第 1 号，1925 年 1 月 10 日。汉列忒即哈姆雷特。

⑦ 鲁迅 《〈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后记》，《解放了的堂吉诃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4 年版，131 页。

⑧ 姚锡佩 《鲁迅研究资料》（第 22 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9 年。

⑨ 谢六逸 《西洋小说发达史》，《小说月报》13 卷第 2 号（1922 年 2 月 10 日出版）。

⑩ 郑振铎 《文学大纲》，载《小说月报》16 卷第 3 号（1925 年 3 月 10 日出版）。

⑪ 唐弢 《唐弢杂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5 年版，123 页。

⑫ 赵振江 《中国与西班牙——文学的交流与互动》，载《中外文化交流史》（下卷），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7 年版，921 页。

⑬ 《惩恶扬善故事集》即《塞万提斯全集》（1997）中文版第五卷中由 13 个短篇小说组成的《警世典范小说集》的选译本。陈凯先的译本取名为《塞万提斯训诫小说集》（重庆出版社 1992 年版）。

⑭ 叶君健 《〈堂·吉诃德〉的现实主义——纪念〈堂·吉诃德〉出版三百五十周年》，载《光明日报》1955 年 11 月 25 日。

⑮ 周扬 《纪念〈草叶集〉和〈堂吉诃德〉》，载《人民文学》1955 年第 10 期。

⑯ 王淡芳 《塞万提斯和他的杰作堂吉诃德》，载《人民文学》1955 年第 10 期。

⑰ 参见舒建华对钱理群的专题访谈 《堂吉诃德与我们的时代》，载《中华读书报》1998 年 2 月 6 日第 18 版。

⑱ 杨绛 《堂吉诃德和〈堂吉诃德〉》，载《文学评论》1964 年第 3 期。

⑲ 杨绛 《春泥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79 年版，28 - 30 页。

- ⑳ 杨绛 《重读〈堂吉珂德〉》，载《外国文学研究集刊》(一)，中国社会科学院1979年9月。
- ㉑ 文美惠 《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光明日报》1978年8月22日 《略谈〈堂吉珂德〉》，载《文学评论》1978年第3期 《塞万提斯和〈唐·吉珂德〉》，载《河北文学》1982年第10期。
- ㉒ 孟宪强 《堂吉珂德不是骑士的典型形象》，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
- ㉓ 秦家琪、陆协新 《阿Q和堂吉珂德形象的比较研究》，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类似的文章还有陈涌：《阿Q与文学经典问题》，载《鲁迅研究》1981年第3期；安国梁、张秀华 《堂吉珂德和阿Q——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这类研究延续至21世纪，如张德超 《堂吉珂德与阿Q之比较——两个滑稽、荒唐的精神胜利者》，载《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教育文化版；黄楚晴 《从〈堂吉珂德〉与〈阿Q正传〉、〈狂人日记〉看塞万提斯与鲁迅的思想启蒙》，载《东京文学》2009年第2期；刘建军 《阿Q与桑丘形象内涵的比照与剖析——兼论比较文学批评的一个视点》，载《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1期。
- ㉔ 王远泽 《论堂吉珂德形象的典型性》，载《湖南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
- ㉕ 庄美芝 《人类的两种永恒冲动——堂吉珂德与福斯塔夫之比较》，载《国外文学》1989年第2期；侯传文：《福斯塔夫与堂吉珂德喜剧性比较》，载《青岛大学学报》1990年第1-2期。
- ㉖ 陶嘉炜 《谈中西续书》，载《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
- ㉗ 刘梦溪 《〈堂吉珂德〉的前言和〈红楼梦〉第一回比较》，载《红楼梦学刊》1984年第2期。
- ㉘ 陈众议 《魔幻现实主义与〈堂吉珂德〉》，载《读书》1986年第2期。
- ㉙ 张绪华 《试论98年一代的堂吉珂德研究》，载《外国语》1986年第6期。
- ㉚ 陈国坚 《试谈〈堂吉珂德〉中同义词的运用》，载《现代外语》1983年第4期 《〈堂吉珂德〉的音韵美》，《现代外语》1988年第3期；黄永恒 《妙趣横生别具一格——〈堂吉珂德〉谚语漫议》，载《外国文学专刊》1985年第1期；严永通 《串串珍珠贯全书——谈〈堂吉珂德〉的谚语运用》，载《唐都学刊》1988年第2期。
- ㉛ 唐民权 《塞万提斯及其〈堂吉珂德〉小议》，载《外语教学》1980年第2期。
- ㉜ 吴士余 《结构形态：点、线与方块的几何组合——〈堂吉珂德〉艺术谈》，载《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2期。
- ㉝ 吴士余 《画面：形象的视觉感——〈堂吉珂德〉艺术谈之一章》，载《名作欣赏》1987年第2期。
- ㉞ 饶道庆 《意义的重建：从过去到未来——〈堂吉珂德〉新论》，载《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4期。
- ㉟ 董燕萍 《写实与虚构的统一——堂吉珂德的模仿真实》，载《外国文学评论》1998年第3期。
- ㊱ 杨传鑫 《论堂吉珂德形象》，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5期。
- ㊲ 周宁 《幻想中的英雄——〈堂吉珂德〉的多层含义》，载《厦门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他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忏悔录’——纪念〈堂吉珂德〉出版四百周年》一文中再次强调，“〈堂吉珂德〉的主导性情节模式暗合了普遍的英雄原型。这些原型曾经反复出现于宗教中、神话中，文学尤其是悲剧作品中。”见2005年《文景》，<http://www.ewen.cc>。
- ㊳ 张凌江 《〈堂吉珂德〉写作动因新解》，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
- ㊴ 李德恩 《重读〈堂吉珂德〉》，载《外国文学》2001年第2期。
- ㊵ 陈广兴的文章《现代性痛苦的丰富阐释——读钱理群〈丰富的痛苦〉》点评了这部著作，载《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1期。
- ㊶ 钱理群 《丰富的痛苦——堂吉珂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60-161，191页。
- ㊷ 董燕生 《西班牙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
- ㊸ 胡真才 《出全集：严肃的大事难事——中文版〈塞万提斯全集〉编后谈》，载《出版广角》1997年第4期。
- ㊹ 陈凯先的四篇论文分别载于《外国文学报道》1985年第2期、《当代外国文学》1996年第2期、《中华读书报》1997年9月17日和《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 ㊺ 刘佳林 《纳博科夫与堂吉珂德》，载《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曾洪伟 《哈罗德·布罗姆论塞万提斯和〈堂吉珂德〉——兼谈其文本批评实践的特点和启示意义》，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5期。
- ㊻ 腾威 《〈堂吉珂德〉的元小说性》，载《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
- ㊼ 宗笑飞 《塞万提斯反讽探源》，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3期。
- ㊽ 蒋承勇 《〈堂吉珂德〉的多重讽刺视角与人文意蕴重构》，载《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张伶俐持类似观点，“在认知范式上，作者已经意图借此小说进行

反讽, 讽刺自己, 讽刺社会, 讽刺生活, 讽刺生活中的人群; 在讲述范式上, 作者更是处处运用反讽叙事角度和结构, 夸张而真实地再现了一个理想人物的尴尬; 在语体范式上, 作者采用言语反讽、情境反讽和戏剧性反讽相结合的手法, 突出了人物处境的荒诞。”参见《〈堂吉诃德〉的反讽叙事话语范式》, 载《社会科学家》2006 年第 2 期。

- ④ 刘林 《由〈堂吉诃德〉伪续作引发的小说创作问题》, 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 年第 1 期。
- ⑤ 叶青 《狂欢中的终结者——重读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载《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4 期。
- ⑥ 蹇昌槐 《〈堂吉诃德〉与“虚拟殖民”》, 载《外国文学研究》2004 年第 6 期。
- ⑦ 索斌 《挑战风车的巨人是谁: 塞万提斯再研究》, 载《回族研究》2005 年第 2 期。该文后分上下篇以《在唐吉诃德的甲冑之后》之名刊登在《读书》2005 年第 6 期。
- ⑧ 庄丽肖 《塞万提斯身世之谜或告破解》, 载中国文化传播网 2011 年 2 月 21 日。
- ⑨ 马联昌 《塞万提斯的中国情结——〈唐吉诃德〉下卷〈献词〉释疑》, 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5 年

第 16 卷第 2 期。

- ⑩ 李德恩 《堂吉诃德: 伟大与渺小——兼论〈堂吉诃德〉中后现代主义小说特征》, 载《外国文学》2009 年第 2 期。
- ⑪ 李德恩 《论堂吉诃德之死》, 载《外国文学》2010 年第 6 期。
- ⑫ 李德恩 《论〈堂吉诃德〉中的缺席者: 魔法师和杜尔西尼亚》, 载《外国文学》2011 年第 5 期。
- ⑬ 陈众议的《经典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以〈堂吉诃德〉为个案》为此专著的部分章节, 参见《外国文学评论》2009 年第 1 期。
- ⑭ 董燕萍 《写实与虚构的统一——堂吉诃德的模仿真实》, 载《外国文学评论》1998 年第 3 期。
- ⑮ 林一安在《中华读书报》上先后发表了《堂吉诃德及其坐骑译名小议》(2003 年 3 月 5 日) 和《莫把错译当经典》(2003 年 8 月 6 日)。之后他又在《外国文学》2004 年第 3 期上发表了《“胸毛”与“瘸腿”——试谈译文与原文的抵牾》, 同期刊登的还有陈众议的《评“莫把错译当经典”——与林一安先生商榷》。陶梅的《从〈堂吉诃德〉的新译本说开去》就杨版和董版的差异进行了点评, 见《外国文学》1995 年第 6 期。

Review and Analysis of Study of Cervantes' Novel in New China in the Last 60 Years

WANG Jun

Abstract: As the most famous Spanish novel in China, *Don Quixote* has a lasting charm for its richness and versatility. Based on the review of Lu Xun and Zhou Zuoren, Chinese scholars and readers offer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of Don Quixote, who has become a typical image of idealism in the Chinese mind. How this literary masterpiece has influenced Chinese culture constitutes a basic topic for the study of Cervantes in China.

Key words: Cervantes, *Don Quixote*, study of Cervantes in China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葡语系)

责任编辑: 魏丽明